

明末清初
党争视阈下的
钱谦益文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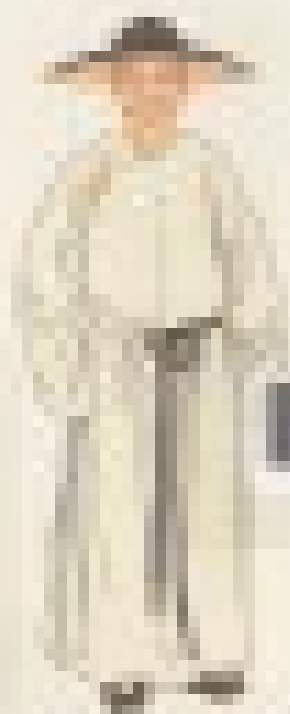
张永刚 著



凤凰出版社

明末清初
竞争视阈下的
钱谦益文学研究

傅成刚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明末清初
党争视阈下的
钱谦益文学研究

张永刚 著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明末清初党争视阈下的钱谦益文学研究 / 张永刚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506-1451-2

I. ①明… II. ①张…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
中国—明清时代②钱谦益 (1582~1664)—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64300号

书 名	明末清初党争视阈下的钱谦益文学研究
著 者	张永刚
责任编辑	林日波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凤凰出版社 (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有限公司 南京浦口大桥北路京新村546号, 邮编: 210031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字 数	285千字
版 次	2012年7月第1版 2012年7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1451-2
定 价	38.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电话: 025-58849828)

目 录

绪 论	1
一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2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	7
三 研究的方法、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9
 第一章 溺于王李,悟于孟阳的初创期	12
第一节 励志为学,初识东林	13
一 “争国本”与张居正改革	13
二 钱谦益家世及个性的形成	27
第二节 学兼朱王,心折孟阳	42
一 钱谦益对程朱学与阳明学的取舍	42
二 “嘉定四先生”对钱谦益文学取向的影响	56
 第二章 推尊唐宋,取法公安的转折期	70
第一节 崭露头角,首厄科场	70
一 “三案”之争	70
二 钱谦益与庚戌科场案	84
第二节 返经正学,取径唐宋	100
一 钱谦益对归有光及汤显祖学术思想的继承	100
二 钱谦益与袁中道对公安派文学观念的理解	111

第三章 萌折灵心,蜚启世运,茁长学问的确立期	122
第一节 列名党籍,再厄关节	123
一 东林党“六君子”、“七君子”事件	123
二 钱谦益与浙阉关节案	139
第二节 灵心世运,学问为途	148
一 “灵心”、“世运”、“学问”诗论体系的初步形成	148
二 钱谦益与钟惺对竟陵派文学观念的理解	159
第四章 折唐入宋,开清诗风的成熟期	171
第一节 相尊党魁,三厄阁讼	172
一 《三朝要典》与钦定逆案	172
二 钱谦益与枚卜案、丁丑狱案及周延儒入阁	188
第二节 致用为本,针砭复古	206
一 钱谦益对明代文学复古观念的评议	206
二 钱谦益与黄宗羲的文学取向	215
第五章 通经汲古,全面发展的主盟期	231
第一节 大节已亏,试图晚盖	232
一 东林党与阉党的余争	232
二 钱谦益谄事马、阮与反清复明运动 ¹	245
第二节 言为事功,领袖虞山	265
一 钱谦益在清初诗学观念的取向	265
二 钱谦益与虞山诗派	286
附录 东林党政治活动辑录	295
主要参考文献	317
后 记	325

绪 论

明末清初易代之际,是中国封建史上乱象频生的时期,思想上的裂变、政治上的兴废、学术上的分野、文坛上的喧嚣,交织成一幅浓墨重彩的壮丽图景。对于这一时期的历时性考察,向来以史学研究居多,而政治、学术与文学的交叉研究则甚少。一方面因为这一时期千头万绪,错综复杂,涉足其间难度很大;另一方面,文献资料汗牛充栋,纷纭驳杂,难以辨识,也给交叉研究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如何将这一时期的政治、学术与文学交织的复杂局面梳理清楚,历来都是一个让研究者望而却步的难关。诚如吴承学先生在《一个期待关注的学术领域——明清诗文研究》中谈到:“在史学界有关东林党争的研究甚多,但文学界对东林党争与明代中后期文人集团乃至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关系还缺乏足够的研究。”^①东林党争是明末清初之际最为重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伴随着党争的进程,社会各个领域掀起了急剧而激烈的变化,迄于明亡。因此,在这一易代之际宏观的历史时空和社会背景下,将党争与文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进而揭示这一时期政治、学术与文学交织的脉络,就成了一个摆在研究者面前的可以操作的崭新课题。而进行这样的研究无疑也具有很大的挑战性,由于命题宏观、牵涉面广、线索多维,所以难度相当大。因此,找到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为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一般来说,文学的本体研究主要包括对作家、作品和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等的研究,以对单个作家的研究来切入主题无疑是最易操作的选择。

^① 《文学遗产》编辑部编《世纪之交的对话:古典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考察明末清初之作家,既密切联系党争,又在文坛上卓有成就者,以钱谦益最具代表性。一方面,他身为东林党魁,却又首鼠两端,屈节仕清;另一方面,他虽为文坛盟主,除明末复古之余习,开清初宗宋之风气,却又嗤点前贤,夹杂个人意气,颇受后人诟病。诚如金鹤冲所论:“先生一为党人所排,一为采《列朝诗集》,结弹世之宗主,于是杂然欲杀。生前之谤,身后之毁,多由于此。不独诟詈其出处,甚至非议其文章,不知天下自有公论也。”^①因此,对于身兼东林党魁与五十年文坛盟主的钱谦益,历来见仁见智,有颇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 本课题的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关于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党争及文学关系的综合研究,尚未见有系统性的专著问世。仅就文学层面而言,学界对钱谦益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上世纪80年代以前,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不多,研究著作着力点亦多集中于对钱谦益履历的史料整理。如民国初期金鹤冲的《钱牧斋先生年谱》对钱谦益一生行实进行了粗略的考量,篇幅过多地集中记述钱谦益入清后的抗清活动,而对其在明朝的四分之三生命历程中的所为记述则甚为简略。金谱的旨向甚为明了,力为钱谦益翻案,试图改变乾隆以来对钱谦益的“恶传”:“先生以《初学》、《有学集》诋谤清室,触清高宗之怒,命销毁其书籍。后又诏国史馆撰《贰臣传》,列入乙编。先生遂得恶传。如枚卜,如钱千秋关节,《明史稿》及《明史》二书中,周延儒、温体仁、路振飞、毛羽健、黄宗昌、吴甡、李标等传,都有公论,诚是千秋信史。而清史先生本传,则乾隆三十四年以后,史官逢迎高宗之旨,故为贬抑之词,不顾其与《明史》之歧异矣。高宗能厄之于一时,而不能厄之于千古。”^②上世纪60年代,陈寅恪先生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穷其余生之心血,以文史兼擅之大手笔,对钱

^{①②} 钱谦益著,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附录》(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971页。

谦益与柳如是之作品详加考察,钩沉索隐,揭示出了钱谦益在入清后从事反清复明活动中的微妙心态与行迹。由此可见,80年代以前学界对钱谦益的研究还停留在因人废言的阶段,对钱谦益文学成就的认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钱谦益其人的是非做论断。对此,严迪昌先生曾有一段平允之论:“牧斋在明末已是东林党巨魁之一,深于权术,所望在入阁。政争失败后,则改志修史,以耆宿称东南。甲申明亡,政局多变,牧斋迹似进退失据,然就本质言,实系其晚明政治生涯的习性的延续。诚然,方苞的‘其秽在骨’之类的诛心之论容或过刻,乾隆帝‘朱谕’痛斥‘以从前狂吠之语列入集中,其意不过欲借此以掩其失节之羞’,‘非复人类’,‘可鄙可耻’云云,也无非是专制帝王出于其政治需要的姿态,不足为据。然而如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跋》以钱氏比之范蠡入吴,李陵降匈奴,是‘泣血椎心,太息痛恨于天之亡我者,且不为死生祸福动摇其心’一流人物,又未免太离谱。”^①

进入80年代以来,学界开始对钱谦益有了较多的关注,视角也转向了对其文学成就的探讨,这是关于钱谦益研究的重大转变。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胡明先生的《钱谦益诗论平议》^②一文,从“破”和“立”的方面辩证地论述了钱谦益的诗学理论,“破”指批判前后七子与竟陵派,“立”指主张抒写真情,重视诗歌与世运的关系。胡明先生此论可视为学界对钱谦益研究的重大突破,在研究方法与方式上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裴世俊先生的《钱谦益诗歌研究》^③是关于钱谦益研究的第一篇博士论文,全文从诗歌研究的角度对钱谦益一生得失进行了筚路蓝缕的开拓工作。作者综合钱谦益一生的文学活动,将纵向的明清易代之际因政局的变化而导致的诗歌风格变化与横向的政治家、诗人、文论家等的文学成就相比较,进行多方面的综合观照,同时对钱谦益的功过

① 《清诗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2—363页。

② 《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第2期。

③ 苏州大学1985年博士论文,宁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是非进行了评判。钱仲联先生在该书序中指出,钱谦益“既有东林党人的正义性,又显得才大识暗,志锐守馁;有坚持抵御外侮的思想,但又仇视农民起义军;投靠马、阮,却在党争峡谷中进退失据,一些言论有阿附马、阮之嫌,但又确有见地;投降清朝,旋即悔恨痛苦,自图晚盖,参加抗清复明活动等等,都应全面分析,不应只见其一,不见其二”^①。其后,孙之梅先生《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一书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了钱谦益文学观念演变的三个阶段:一、早期的文学准备(万历十年至万历三十四年);二、文学观念的转变形成期(万历三十五年至天启元年);三、文学观念的确立期(天启二年至崇祯十七年),着重考察了钱谦益入清后的学术活动及诗歌创作。袁世硕先生尤其肯定了孙之梅先生对钱谦益《投笔集》的关注,他认为钱谦益降清后所作的《投笔集》“以次杜甫《秋兴八首》之韵为模式,共写了十三叠凡一百零八首,成为中国古代诗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大组诗,喻意隐微,与同时而又命运相近的吴伟业之歌行诗,都堪称是清初诗坛上有超迈前人的独特创作的杰作。怎么能因人废言,以作者一时之失足而摈斥其文学成就!”^②推动钱谦益研究进展的是接下来出现的一批质量较高的博士论文,先后有郝润华先生的《〈钱注杜诗〉与诗史互证方法》(南京大学 1999 年博士论文,黄山书社 2000 年版)、张永贵先生的《钱谦益与晚明社会》(复旦大学 2000 年博士论文)、朴璟兰先生的《明末清初的文学与思想:以震川与牧斋为重心》(复旦大学 2001 年博士论文)、邬烈波先生的《钱谦益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南开大学 2003 年博士论文)、焦中栋先生的《论钱谦益的明代文学批评》(浙江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丁功谊先生的《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首都师范大学 2005 年博士论文,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这一批博士论文的出现极大地开拓了钱谦益研究的领域,深化了

① 《〈钱谦益诗歌研究〉序》,《宁夏社会科学》1992 年第 2 期。

② 《卷首缀语》,孙之梅《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齐鲁书社 1996 年版,第 4 页。

钱谦益研究的力度。更为可贵的是标志着对钱谦益的研究完全进入到“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人”的崭新阶段,对钱谦益的文学思想、创作成就开始有了普遍的关注,新的研究视角亦投向了更深层面。如郭烈波先生的《钱谦益心态与文学思想研究》和丁功谊先生的《钱谦益文学思想研究》都将钱谦益的心态与其文学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探讨,对钱谦益心态的探究,揭示出其伴随时局的变化,内心不断纠葛演绎的过程,从而影响其文学思想的变轨,外化为文学风格的不同样貌。此外,在对钱谦益研究的专著当中,值得肯定的还有裴世俊先生的《四海宗盟五十年——钱谦益传》^①,此书堪称研究钱谦益的第一本传记。作者以钱谦益生平事迹为线索,将其一生分为前明时期(明神宗万历十年至崇祯十七年)、明清交替时期(南明弘光元年至清世祖顺治三年)、入清时期(顺治四年至圣祖康熙三年)等三个阶段,细致入微地描述了钱谦益作为东林党魁兼文坛盟主“始厄于党祸,再厄于阁讼,三厄于刊章”的仕途沉浮,及其降清后从事反清复明活动而试图晚盖的自悔情结。

总体来说,学界目前对钱谦益的研究已经全面展开,成果亦可谓丰富,但仍然存在研究不够充分的环节。如关于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党争的研究,所论不多,尚未见有系统性的专著问世。见之于单篇论文者,也只有孙之梅先生的《钱谦益与东林党》(《阴山学刊》1990年第1期)值得参考。文章提到:“总观钱谦益与东林党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万历二十四年拜谒顾宪成到万历末年,是钱谦益接受东林党的影响、赏识、奖掖、提携入仕的时期;天启年间,是钱谦益成为东林党的中坚分子、主要干将的时期;崇祯朝,是钱谦益作为东林党魁的时期。”揭示了钱谦益与东林党关系的发生、发展过程。总体而言,从历史层面对明末党争的研究颇多,但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对明末党争与文学的交叉研究稍显薄弱,笔者曾试图发前人所未发,对这一领域进行全面而系统的研究,故以《东林党议与晚明文学活动》为博士论题,将晚明时期

^① 东方出版社 2001 年版。

党争与举凡文社、流派等的活动全面铺开,进行政治、学术与文学方面的逐层探析。然而由于论题过于宏观,在研究过程中操之过急且求面面俱到,致使所论多流于肤泛。而如果能在和党争联系的诸多作家中选取最具代表性的一例,进行个案研究,则有助于将这一问题深化。综合学界关于钱谦益研究的现状,则以其为例是再合适不过了。理由如下:

其一,钱谦益名列《东林党人榜》、《东林朋党录》、《东林同志录》、《东林籍贯录》、《东林登科录》、《盗柄东林夥》、《夥坏封疆录》等多种东林党人名单。在《东林点将录》中,他更是被比作梁山英雄浪子燕青,号为“天巧星浪子”。在当时比较著名的文人中,钱谦益在党争中的地位最为重要,他也坦言“流俗相尊作党魁”^①,以“党魁”自命。然其在党争中屡遭挫折,仕途多舛,最后竟至于屈节降清,从东林党魁变为名教罪人,不能不说是其政治上的悲剧。顾苓在《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中指责钱谦益:“公不死,为东林之门户羞,公死而东林之门户绝。东林以国本为终始,而公与东林为终始。”^②

其二,钱谦益在明末清初“四海宗盟五十年”。清代学者阎若璩在《南雷黄氏哀辞》中指出:“海内读书者,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曰钱牧斋宗伯、顾亭林处士及先生梨洲而三。”^③凌凤翔《初学集序》中也有对钱谦益的评价:“适当诗派中衰之际,实开熙朝风气之先,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由此可以看出钱谦益在明末清初文坛上的崇高威望。即使在其退居林下之后,也以之为中心,形成了“虞山诗派”。

其三,钱谦益在明清之际的文坛上算得上是“好事者”,他对复古派、公安派、竟陵派一一指摘点评,言论间透出晚明文人所普遍具有的

① 《十一月初六日召对感恩述事二十首》其十,《初学集》卷六,《钱牧斋全集》(第1册),第190页。

② 《塔影园集》卷一,上海书店1994年版。

③ 《潜丘札记》卷三,清刻本。

乖戾之气,是明末文人中最突出的代表。陈广宏师在《竟陵派研究》^①的结语中指出,钱谦益对竟陵派的指摘,“绝对不限于因个人在文坛上的显晦升沉而带来的成见,而明显具有所在社会、阶级的背景”。

其四,从学术层面而言,钱谦益转益多师,少时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学,二十六岁以后,又师从“狂禅”派管志道,并且对当时“狂禅”派的核心人物李贽大加褒奖,认为其“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间,别出手眼”,由书及人,“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②。对当时截然对立的两种学术思潮,可谓是兼收并蓄。

综上所述,以钱谦益为切入点,研究其与党争的关系,可涉及明末清初政治、学术、文学等多个层面的内容。因而将钱谦益所历事件穿插在党争过程中进行分析探究,不仅可成为一部人物传记,也可成为一段政治史、学术史、文学史,既可以弥补学界对钱谦益研究的不足,又可以与笔者的博士论题完成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深化对明末清初党争与文学的研究,进而形成立体化的研究格局。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基本思路

钱谦益主盟明清文坛五十余年,作为书生,他无疑是得意的,然其仕途多舛,深陷党争,难以自保。纵然他无意于党争,但因与东林党瓜葛非浅,后竟被目为“党魁”。政客与书生的双重身份使其在政治、学术及文学领域皆不甘寂寞。

政治上,钱谦益与东林党的关系始于其十五岁时随父拜谒里居的顾宪成,顾命二子与之游,可谓有提携之意。从此他少年得志,庚戌科考前已名闻东南。虞山诗人冯舒说钱谦益“未第时,已骥骥为党魁矣”^③。至于以庚戌科场关节案为伏线引发了以钱谦益为中心的一系

①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松影和尚报恩诗草序》,《有学集》卷二十一,《钱牧斋全集》(第 5 册),第 884 页。

③ 《虞山妖乱志》,上海文明书局 1915 年版。

列党争事件,如天启浙阉事、崇祯枚卜事、丁丑狱案及联合复社助推周延儒入阁,使其名声大噪。明亡清兴,钱谦益以弘光朝礼部尚书降清,从东林党魁变为名教罪人。政途上的大起大落曾使钱谦益决意不再著述,一心向佛,以求悔过。然而,接连因丁亥狱案、黄毓祺案牵连入狱后,江南遗民的道义声援,使他完成了精神救赎,遂不顾年老体迈,为恢复故国而努力奔走。《投笔集》即是其晚年有投笔从戎之志的心态表白。弟子归庄论其师一生的穷途遭际,言之凿凿:“窥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盖,何天之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赍志以终。人谁不死?先生既享髦耄矣,呜呼!我独悲其遇之穷。”^①

学术上,在当时王学与东林学并立而激烈对峙的情势下,钱谦益尚能摆脱明人“非此即彼”的观念,会通地看待两家的学术源流。一方面,钱谦益十五岁时访学东林领袖顾宪成,适应了当时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潮,与东林学派在摒弃“俗学”、扭转空疏学术风气的层面上保持一致态度。其“返经”的理念与东林学派“尊经”的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进而“繇经术达于世务”^②,实现经世治用。另一方面,钱谦益二十六岁时向“狂禅”派管志道行弟子礼,认为管氏的学问“贯穿千古”,以“姚江四语”作宗旨,可为“百世师”^③。对“狂禅”异端李贽,钱谦益称之为“异人”,对其著述深为服膺:“卓吾所著书,于上下数千年之间,别出手眼,而其掎击道学,抉摘情伪,与耿天台往复书,累累万言,胥天下之为伪学者,莫不胆张心动,恶其害己,于是咸以为妖为幻,噪而逐之。”^④由书及人,“思置其人于师友之间”。

① 《祭钱牧斋先生文》,《归庄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471页。

② 《常熟县教谕武进白君遗爱记》,《初学集》卷四十三,《钱牧斋全集》(第2册),第1120页。

③ 《湖广提刑按察司金事晋阶朝列大夫管公行状》,《初学集》卷四十九,《钱牧斋全集》(第2册),第1254页。

④ 钱谦益《卓吾先生李贽》,《列朝诗集小传》闰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705页。

文学上,钱谦益声名煊赫,身处明清之际,承前启后。钱谦益在五十年中秉承“文章关乎气运”^①的宗旨,以其特有的执着和意气对当时的诸多文学流派进行了品评,虽时有过激言论,且有非议,但无碍其以文章救世的责任感,而这恰恰是其仕途屡屡失意的反衬。无论穷达,钱谦益始终是一位斗士的形象,即使降清之行为,依其自己的说法,也是为了保全一城百姓,以待日后崛起之机。事实上,他确实为反清复明之事业四处奔走、呼号呐喊,以至于乾隆皇帝亲自点名,将其列于《贰臣传》,并禁毁其著作。一方面,钱谦益对明代文学流派的批评夹杂有党争的意气,如对竟陵派的评价,言辞近于谩骂,开启后世对竟陵派误解的端绪。如清初三大家中的顾炎武引南居益语称钟惺“病狂丧心,诟止文人无行”,甚至将明亡的责任归咎于他,称“其罪虽不及李贽,然亦败坏天下之一人”^②。另一方面,其对复古派宗唐的反拨,开创了清初崇尚宋风的新局面,“海内宗虞山教言,于南渡推放翁”^③。

总体而言,钱谦益在政治、学术及文学上兼具多重身份,皆颇多争议,其在文学上的集大成固然有文学自身发展的客观因素,然与其一生纠结于党争也不无关系。结合钱谦益在党争中不断变化的身份及其学术上的追求,追踪其文学思想的变化轨迹,对其进行一番全面总结,无疑也是条可取的研究路径。

三 研究的方法、重难点及创新之处

本书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理念为指导,从政治、学术与文学三个层面逐一观照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党争及文学的关系。就宏观方面而言,主要以党争为据,对钱谦益一生予以分期:

第一期,万历三十七年(1609)之前。钱谦益先后于万历二十四年

① 《胡举人应麟》,《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第447页。

②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八,岳麓书社1994年版,第668—669页。

③ 毛奇龄《盛元白诗序》,《毛西河文集》卷二十八,清康熙刻本。

拜谒顾宪成、三十四年(1606)科考乡试得魁南都,遂名闻东南。在学术上,这一时期的钱谦益尚在东林学与王学的论辩中左右徘徊,在文学上则进行着拟古与非拟古的反思。

第二期,万历三十八年至万历四十八年。万历三十八年的庚戌科场案是这一时期钱谦益第一次卷入党争的重要案例,也肇始了其后来身陷党争而难以自拔的局面。万历三十九年的辛亥京察,围绕李三才入阁问题,齐、楚、浙三党与东林党激烈论争,徐兆魁上疏正式以“党”称呼东林。这十年落职期间,朝廷党争日益激烈,钱谦益虽身处林下,却并未忘怀国事。他在关注时局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东林党重要人物叶向高离相位的痛惜。在学术和文学上,钱谦益开始了根本性的转变,与“嘉定四先生”的交往,使其冲破拟古藩篱,转向对唐宋古文的推崇。

第三期,天启时期,七年间钱谦益因党争两起两落。首先,浙闽关节案是庚戌科场案的继续,钱谦益因此丢官落职。其次,阉党的白色恐怖活动,东林“六君子”、“七君子”先后罹难,钱谦益因与东林党人的交往而遭削籍,返乡后惶惶不可终日。在学术和文学上,此一时期复社崛起,尊经复古的思潮逐渐传播,钱谦益积极响应,适应时代的需求,初步形成了“灵心”、“世运”、“学问”的诗学体系。

第四期,崇祯时期,即所谓“流俗相尊作党魁”的时期。东林党重要成员相继陨落,阉党亦被整肃,朝廷面临政治一新的局面。因与党争的瓜葛和在文坛上的声誉,钱谦益颇负重望,被拟荐枚卜入阁,然因温体仁重提浙闽关节案而一败涂地。温体仁入阁后,又发生了诬告钱谦益的“丁丑狱案”,由于太监曹化淳的营救才转危为安。其后,不甘失败的钱谦益联合复社领袖张溥策划周延儒拜相,却受到后者的愚弄。在学术及文学上,钱谦益对明代文学复古观念进行了总结,体现了其作为文坛盟主对学风及文风转折的探索。

第五期,清初南明三政权时期,钱谦益出任礼部尚书,谄事马士英、阮大铖,但并未能消除党争的隔膜,马、阮欲借“南渡三遗案”将东林及复社成员一网打尽。钱谦益目睹时局危亡,颓势已不免,遂乞修史以自慰。顺治二年(1646)五月,钱谦益以礼部尚书请降,大节已失,无心为

官,乞假回乡,后以残年奔走呼吁抗清,试图晚盖。入清后的钱谦益在文学观念中呈现出“言为事功”、“诗以存史”、“以史证诗”、“出入宋元”等倾向,在其领导下的虞山诗派吟出了黍离之悲,体现了遗民诗人对现实政治的关注。

总体而言,以分期的方式,从政治、学术及文学三个层面着眼将钱谦益一生置于明末清初党争的大背景中进行研究,应该可以得出一个对其系统客观的评价。

本书重点在于理清钱谦益在一系列党争事件中的思想发展轨迹及其所采取的策略,并将其政治行为与当时学术思潮的变换相联系,加以追根溯源,借此反观其文学取向。在具体的问题上,重点考察钱谦益同参与党争的重要人物及团体、流派的交往活动,以揭示其在党争中所起的作用。难点则在于如何有效地从政治、学术及文学三个关联层面将钱谦益安置在明末清初党争的大背景中,因为这一阶段的党争是历史上时间最长、涉及人员众多、最为复杂和惨烈的事件,而同时段的学术及文学也存在着同样的复杂性,远超任何一个历史时段。要想以钱谦益为线索将所有这些事件历史地、系统地穿插起来,并进而触及到文学的内在蕴涵及表现层面,无疑具有相当大的难度。

当然,本书在研究的过程中要探讨并希望厘清如下几个问题:一是政治上,钱谦益先是沉浮于党争,晚年又失节降清,终而反清复明,通过梳理其在党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和起到的作用以及降清又反清的心态,对其政治品性做出客观的评价。二是学术理念上,钱谦益左右于程朱学与阳明学之间,终因政治危机的影响,转而倡导摒弃俗学、返归经学,以达到济时救世之目的,对救正空疏学风的影响应有重要的作用。三是文学观念上,钱谦益以文坛盟主的身份高屋建瓴地对明代文学复古观念进行了总结,又揭示出此一观念在易代之际呈现出的新特性,开启了清初宗宋之风,体现了其为文学的应世而变勇于担当的职责。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研究具体的问题时,存世的文献常存在着待开发性,因为以不同的视角切入同样的材料,有可能会提炼出新的观点,进而对结论的得出起到不同程度的积极作用。